

敦煌學

第七輯

敦煌學會編印

STUDIES ON TUN-HUANG

VOLUME VII

Association of the Studies on Tun-Huang

Hwa Kang, Taipei Taiwan R. O. C. 1984

敦 煌 學 近 況

神田喜一郎 撰

郭自得 王三慶 合譯

(一)

昭和二十七年（譯者案：西元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我曾經在龍谷大學圖書館舉行的第三十八屆京都大藏會席上，嚐試過一場以「敦煌學五十年」為題的演講。當時很慚愧，我的手邊對於敦煌學的戰後新出版物一無所有。自然，對敦煌學的近況，無從說起。此後得到了若干材料，所以今天存有補充前次演講的意義，而簡單的報告一些敦煌學的近況。

上次演講「敦煌學五十年」時，我曾經說過：願再度使敦煌學開出美麗的花朵。然而，當時敦煌學已漸漸朝向隆盛的機運。尤其最近的發展，已可聽到敦煌景氣之聲的程度。不過，最近的敦煌學與往昔的敦煌學比較，其內容已有若干的變化。往昔的敦煌學，是以從敦煌千佛洞發見的；所謂敦煌古書的研究為主。而近年來，對那些古書的研究，雖然也很盛行。但對於從未被注意過的敦煌千佛洞，以其本身為對象的研究，忽然勃興起來。而以新敦煌學的姿態，堂堂登場。其故安在呢？因今非昔比，今天要到敦煌，已無多大困難了。就以我們日本人而言，畫家福田豐四郎於昭和三十一年六月，自大谷探險隊以來經過五十年，始以日本人的身分親訪敦煌。隨後同年九月，有北川桃雄、龜田東伍兩氏；接著於翌年——三十二年五月，由日本考古學會與每日新聞社所派遣的訪中視察團一行中的駒井和愛，樋口隆康、岡崎敬等，考古學專門的三位教授；再有每日新聞社的安保久武、杉本要吉兩氏，連袂親訪了敦煌。從前欲作實地調查而不可得的敦煌千佛洞，竟然如此的容易參觀。因此，千佛洞本身俄然間聚集了學界的視聽。而對它的研究，於焉勃興起來。之所以如此，實乃得力於上次戰爭的結果。昭和十二年七月，不幸發生了中日事變，而漸漸的呈現長期戰的形態。蔣先生的國民政府爲了要從蘇俄輸入大量的軍需物資，而有橫斷廣漠的甘肅省，通於新疆省汽車公路的大工程。昭和十六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恰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不久，始告開通。這

真是對這一方面的交通，帶來了劃時期的一大變化。又如飛機及其他交通工具加速一層的發達，其結果，前往敦煌已經異於往昔，變得非常的輕鬆。這條汽車公路，是把自古已有的官馬大路拓寬，修建成得以通汽車。其路線是：由甘肅首都蘭州向北，經武威、張掖、酒泉、安西、再進入新疆的哈密。可是並未經過敦煌。要往敦煌，必需從安西在幹線道路上分向西南行進約百二十公里。然而，據說這條路——安敦道路，今天已與幹線道路幾乎沒有什麼差別。

總之，前往敦煌已不比往昔，變得很輕鬆。結果，近年連西洋人也有赴敦煌實地調查的學者。據我所知：一九四八年有美國的韋生（Irene Vongehr Vincent）夫人——她在一九三九年密西根大學的夏季講座裏，聽過支那美術講義以來，內心深受敦煌千佛洞所吸引，遂有了親訪千佛洞的心願。雖非什麼特別專門的學者，卻以西洋人的身分，在戰後第一個踏進了敦煌。而她的先生韋生特氏（John Benjamin Vincent）也於稍後訪問了敦煌，並拍回了大量彩色照片。據說，以彩色照片拍攝千佛洞的，當以韋生特氏為第一人。韋生特夫人於一九五三年出版了一本叫「神聖的綠洲」（The Sacred Oasis）。內容很通俗，可說是一般的敦煌藝術概說兼紀行的刊物，而以插入千佛洞最新的照片近五十張為其特色。遺憾的是她的丈夫所拍攝的彩色照片，僅僅收了一張，真是可惜。繼韋生特夫妻之後，英國大英博物館的東洋部主任著名的葛蕾博士（Basil Gray）於一九五二年五月，應中共之邀，視察了敦煌。博士於一九五九年出版了「敦煌千佛洞壁畫」（Buddhist Cave Paintings at Tunhuang）這部龐大的圖錄。在這圖錄裏，葛蕾博士大量收錄了韋生特氏所拍攝的彩色照片，滿足了我們的渴望。況且，這本圖錄不愧是成於東洋美術專家之手，非常的精彩。不但。聞名的偉利氏（Arthur Waley）為其作序，對於各種解說，似乎也幫了不少忙。偉利氏在日本，已因英譯「源氏物語」而為大家所熟識。對於中國文學或藝術也具有廣博的知識與深厚的造詣，實為一位優秀的學者。他對於敦煌藝術也在一九二三年出版的「中國繪畫研究導論」（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Chinese Painting）中，特設「敦煌畫」（The Tunhuang Paintings）一章，對敦煌繪畫有所論述，又於一九三一年作成斯坦因帶回的敦煌繪畫目錄——「大不列顛博物館和印度德里中亞博物館所藏斯坦因爵士從敦煌尋來的繪畫目錄」（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K. C. I. E. Preserved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n the Museu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Delhi)，近來似乎對於敦煌發見的通俗文學之一種——變文特別用心研究，而把這一方面的知識提供於葛蕾氏，自然使葛蕾氏這本書變得更有價值。面對西洋的葛蕾氏出版了精彩的圖錄，在日本人親訪敦煌者的著作，僅有岡崎教授由訪中視察旅行歸來後，作為訪中考古學視察團報告而出版的「中國考古之旅」中，寫了極簡單的紀行，及去年北川桃雄氏出版了單行本「敦煌紀行」，使我們有些寂寞感。

以上所舉諸人，雖說實地調查了敦煌，但以韋生特夫人在敦煌逗留了十天為最長。其他大抵不過是極短暫的三四天左右而已。因此，就敦煌千佛洞實地的研究，實際不能有過多的期待。那一方面，無論如何還是以長年累月住在敦煌現地，把調查當作畢生工作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諸位所員的業績最值得重視。所謂敦煌文物研究所，最初稱為敦煌藝術研究所。說到它設立的由來，必需溯及剛才所說明的甘肅橫貫公路的開闢。這條公路於一九四一年開通後不久，當時國民政府的監察院長于右任氏視察了這個地方。順便訪問了千佛洞。這時于氏被千佛洞的偉大藝術所打動，又對於其荒廢的現狀，非常的驚駭，而深深的感覺到，無論如何必需擬定嚴格的保存方策，乃向相當於日本文部省的教育部進言。經國民政府一再熟議的結果，遂於一九四三年三月，任命高一涵、常書鴻等諸氏為設立敦煌研究所的籌備委員，即類似於日本所任命的準備設立委員，到了翌年——一九四四年二月一日，始在敦煌的現址正式設置了敦煌藝術研究所。有關當時的經緯，在韋生特氏「神聖的綠洲」中第七四～七六頁有詳細的記事。又「燕京學報」第三十期的「學術團體消息欄」等，也有若干的記載。不過，韋生特氏將正式成立研究所的年分錯了一年。有關這些問題，在中國方面諒必存有更詳細的文獻。只因那些東西都是戰爭中，在重慶或成都等地出版的，今天已不容易入手，實為憾事。總之，是以這種經緯在敦煌現址成立了敦煌藝術研究所。從此，敦煌學將有一大飛躍。不過，還有些事，想擬先提出來進一步談談。

敦煌藝術研究所的開設，固然其直接原因是剛才所說的，由於于右任氏的進言。但事實上，當時這種機運也已成熟。中日戰爭逐漸擴大，一九三八年十月，國民政府由漢口遷移到重慶，隨著國民政府的轉移，各種大學與研究所等文化機構也大多移到重慶。自然，在重慶有了從未看過的多數文化人和知識份子等聚集在一起。對他們而言，重慶是個完全陌生的地方。所見所聞，莫不引起他們的好奇心。例如：四川地方的石器時代文化啦，住在此地的非漢族的語言、風習啦，總之，對於從未被注意的方面，那些文化人卻發見了新的研究原野。

而他們的眼光又轉向更深一層的研究。恰好此時在政治經濟方面，尤其是對西北地方的開發建設，已經成爲被高呼的新課題。因此，大家對西北地方漸漸引起了甚深的注意。在這種情勢下，先前所說的，一九四一年甘肅省橫貫公路的開通，其結果使敦煌的千佛洞便突然浮現在一般大眾與文化人面前。因此，在一九四四年敦煌藝術研究所開設之前，已有很多文化人實已積極訪問了敦煌，而表現了各種成績。

其中，舉其較主要者，由教育部組織的文物藝術視察團與中央攝影社合作，有多位攝影師前往敦煌拍攝了千佛洞的各個石窟。據說，那些照片比以前唯一的千佛洞照片，伯希和的「敦煌石窟」(Les Grottes de Touen-Houang)更爲精彩。遺憾的是它未被出版。但是可能在某些地方展覽過。因此才使中國文化人認識了千佛洞壁畫及塑像；在中國美術史上具有無比優異而重大的價值。關於敦煌的事，在中國也早已喧囂塵上，但那是敦煌古書的事。至於千佛洞的壁畫與塑像等，就幾乎沒有人注意到了。在一九二五年，參加以美國瓦俄那(Langdon Warner)博士——那位使京都、奈良免於被轟炸的有名學者——爲團長而舉行的，美國佛哥博物館(Fogg Museum)主辦的敦煌調查團，而去訪問千佛洞的陳萬里氏，於一九二六年出版的當時紀行「西行日記」中，對千佛洞的壁畫多少曾經注意到了。這就是中國人對壁畫表示關心的第一人。隨後一九三一年，賀昌羣氏在「東方雜誌」第二十八卷第七號發表了「敦煌佛教藝術的系統」這篇很通俗的論文。但有關這方面，還是未被當作一回事。然而，教育部文物藝術考察團與中央攝影社一行所帶來的千佛洞照片，忽然促使了中國文化人間的注意。而給予更加一層刺激的，就是由有名的張大千氏所進行的千佛洞壁畫的模寫事業。

張大千氏是中國聞名的畫家。本名爰，普通都使用其字大千。他是四川省人。最初於一九四〇年春到了敦煌，當時交通工具尙未完備。從成都搭飛機飛往甘肅省蘭州，再乘汽車五天至安西，又乘馬車花了四天，才到敦煌縣城。首次看到千佛洞壁畫的張大千氏，非常的感動。遂發啓了模寫的大願望。逗留了半年之後，爲了重整準備工作，一度返回成都。再於一九四二年引領很多的門人到了敦煌，專心從事千佛洞壁畫的模寫。據說：當時另有西藏喇嘛僧畫家五人，來到敦煌會合協助。花了兩年，完成一百張以上的壁畫模寫。這是很優美、精彩的模寫。一九四四年春在四川成都舉行展覽會時，據說在中國文人間，曾掀起了極大的轟動。雖說這項模寫很精彩，但比不上近年在日本模寫法隆寺的壁畫那種精密的所謂剝落模寫

，可說是極粗略的復原模寫。然而，從來除照片外，將幾乎沒有人看過的千佛洞壁畫，依照原色放大再現，展出了百張以上，當然使一般人大為驚異，而刮目相看。又據聞：張大千氏在舉行該展覽會之前，於一九四三年出版了「大風堂臨摹敦煌壁畫」，翌年——四四年再出版了「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覽特集」。總之，這一模寫的展覽，對中國文化人而言，似乎是個很大的驚異。

張大千氏於逗留敦煌從事千佛洞壁畫模寫的兩年中，重新發掘了很多長久埋在土砂裏的洞窟。千佛洞的各洞窟，有往年伯希和所編訂的號碼，自第一號至第一七二號。張大千氏加上了新發掘的洞窟，以與伯希和所訂號碼完全不同的新方式，重訂第一號至第三〇九號的新號碼，即今天被稱為張大千編號者。當然，張大千編號後來又被敦煌藝術研究所，及其後身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因再發掘很多的洞窟，而更為重新編訂，而有了新的研究所編號。但是這些編號，不僅是洞窟的數目不同，其原來的編號方法也有差異。因此，張大千編號在今天調查各種圖錄與文獻時，仍需加以留意。總之，張大千氏重新發掘很多洞窟，並編訂號碼之事，與壁畫的模寫，都是他所完成的偉大工作。

又張大千氏除千佛洞外，其他還訪過西千佛洞、榆林窟，小千佛洞等石窟寺，模寫其壁畫。所謂西千佛洞，是位於距千佛洞西方四十公里處的石窟寺。其規模當然不及千佛洞。但與千佛洞一樣，存有北魏以來的壁畫及塑像的洞窟。張大千氏對這西千佛洞的洞窟，也編訂了第一至第十九號的號碼。其次，所謂榆林窟，是在安西南方約六十公里處，又被稱作萬佛峽的石窟寺。這裏一共四十窟，有壁畫者二十九窟。張大千氏也給它編訂了號碼。敦煌的千佛洞，正式名稱是莫高窟，與這榆林窟並稱為莫高、榆林二窟。又發見榆林窟——即萬佛峽石窟寺的是斯坦因。據說，以前是沒人知道的。最近偉利氏寫「十八世紀中國詩人袁枚」（“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 London. 1956）——清朝乾隆時，與趙甌北（翼）、蔣心餘（士銓）並稱三大詩人的袁隨園（枚）傳記，才將這石窟寺見載於袁隨園文集一事，予以介紹。這段袁隨園的記述，連博覽的向達氏也未在「莫高榆林二窟雜考」（「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所收）裏引用。偉利氏對此似乎感到很得意，於著名佛教學者李班達爾（W. Liebental）氏的紀念論文集，「中國伊朗學研究」第五卷裏（“Sino-Iranica Studies” vol. V）發表了以「千佛洞傳奇」（A legend about the cave of the Myriad Buddhas）為題的論文時，將同伴事再度的指出。又所謂小千佛洞，是在安西至榆林窟的

途中，最小規模的石窟寺。僅有六窟。正式名稱叫水峽口窟。而西千佛洞、榆林窟、小千佛洞等三個石窟寺中，榆林窟與小千佛洞，斯坦因曾經訪問過。隨後瓦俄那博士也來訪過。尤其瓦俄那博士對於榆林窟的壁畫有以「佛教壁畫——第九世紀洞窟萬佛峽之研究」(“Buddhist Wall painting; a study of a ninth-century grotto at Wan Fo Hsia”)為題的研究，於一九三八年由霍華德(ハーワード)大學出版，而一般卻幾乎無人知曉。又關於西千佛洞，於一九三一年，美國的波琳(B. Bohlin)最初往訪，將一篇介紹文「敦煌西窟新探」(“Newly Visited Western Caves at Tun-Hung”)登載於一九三六年出版的「哈佛亞洲學研究期刊」第一卷第二號(“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vol. 1 No. 2. 1936) 這也幾乎未曾引起一般的注意。然而，張大千氏不但親訪，而且模寫其壁畫。從此，這三個石窟寺遂出了名。這也堪稱是張大千氏的大功績吧。

又幾乎與張大千氏往訪敦煌的同時，另有幾位畫家也訪問過敦煌。其中有一位王子雲者。據悉此人模寫壁畫，不像張大千氏注重色彩，然而對形似這一點卻完成了忠實於原畫的作品。傳說曾在重慶舉行過展覽會。又據說：關山月、吳作人等畫家也曾去過敦煌。關山月氏將所見的千佛洞壁畫用特寫方式畫下各時代的人物像，顯示各時代畫風的差異。而吳作人氏即儘量忠實地，完成了接近所謂剝落模寫的作品。據說：關山月氏又將一篇以「敦煌壁畫的作風」為題的論文，發表於當時在成都出版的「風土雜誌」。但是我尚無緣過目。又其他尚有沈福文、李德輝等漆工家也訪問過敦煌。據說：他們主要是模寫了圖案、紋樣等回去的。總之，從一九四〇年左右起，敦煌的壁畫、塑像等，忽然以大寫的形態出現在中國一般文化人面前。從此敦煌藝術漸漸被喧騰，並賦予很高的評價。

一九四二年，國立中央研究院重新組織西北史地考察團，進行甘肅、寧夏、青海等三省的調查。一行再度往訪敦煌千佛洞。該考察團諒必有其調查報告書。遺憾的是我對此尚無所悉。幸而考察團員之一著名的向達氏，有「西征小記」為題的紀行，見於一九五〇年七月發行的「國學季刊」雜誌第七卷第一期，可以知其大體情況。這一紀行，後來被收錄於一九五七年出版的該氏名著「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增補再版中，今天很容易看到。據此紀行，該氏於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四年兩年間，曾兩度往訪敦煌。也訪問過剛說的西千佛洞或榆林窟。不愧是學者的紀行，不僅是紀行，還有各種歷史或地理的考證，是敦煌學上極為有益的文字。又向達氏另有考證玉門關與陽關題作「兩關雜考」的論文。還有「莫高榆林二窟雜考」，又

寫了研究敦煌歷史有重大關係的張議潮事蹟「羅叔言『補唐書張議潮傳』補正」，與「西北小記」共以「瓜沙談往」之名，一併刊載於「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中。又有謝稚柳者——不知是否西北史地考察之一員——從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間逗留敦煌，專心研究壁畫，將研究結果，於一九五五年以「敦煌藝術叢錄」為題出版。這也是一本很精彩的書。它分為「概述」與「石窟叢錄」二部，「概述」一如其名，將敦煌藝術加以扼要的說明，其記述乃本著親自調查的事實，值得信賴。「石窟叢錄」以千佛洞為首，對西千佛洞、榆林窟、小千佛洞等各窟，一一將其現狀分為洞形、塑像、壁畫、供養人題名等，詳為記載，是其特色，堪稱貴重的紀錄。加上謝氏的文章很巧妙，這一點我也認為是本書的特色。又一九四三年，當時在重慶出版的「說文月刊」，將第三卷第十期作為敦煌特輯專號，滿載了：

衛聚賢 敦煌石室

何正瑣 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

姜亮夫 敦煌經卷在中國學術文化上之價值

董作賓 敦煌紀年

勞 榘 伯希和敦煌圖錄解說

金毓黻 敦煌寫本唐寫本天寶官品令考釋

等論文。這些論文的作者，諒非全部都去過敦煌。又是否與史地考察團有關係？對於那兒的事情我也一無所悉。不過，一九四一至一九四四年間，有各種學者訪問過敦煌，而且都發表了他們的研究，這是千真萬確的事。與剛才所談及的張大千氏等帶來的壁畫模寫相輔相成，當時聚集於重慶、成都等地的中國文化人間，已經掀起了一種敦煌熱潮。敦煌藝術研究所就在這種情勢之下，於一九四四年一月一日正式開始活動了。

這個研究所設立時，最初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的直屬機關。然而開設的翌年，即一九四五年改移國立中央研究院管轄，成為其一部門。一九四九年十月後，今天的中國（譯者案：原稱僑國名，下同）成立，這個研究所也於一九五一年歸於該政府文化部文物局所管。同時改稱敦煌文物研究所，以至今日。雖然經過如此的變遷，研究所的工作卻始終一貫繼續下來。又該研究所長也從開始就是現任的所長常書鴻氏一直連任著。常書鴻氏係浙江省杭州出身。起初在省立工藝學校學染織技術。為攻讀染色而赴法國，在里昂從事研究。後來在巴黎開始學西畫。據說，從那時起便對敦煌藝術心嚮往之。巴黎吉美博物館有很多伯希和帶來的敦煌

畫，諒必目睹斯物而動了心。因此在一九四三年三月，以敦煌藝術研究所籌備委員之一的身分赴敦煌，不久研究所正式成立，即被任命為所長。該研究所的事業，一開始就決定了兩項，第一是保存及修理已荒廢的千佛洞，第二是壁畫的模寫。這是非常艱巨的工作。在此本應詳為報告，但是這與今天所要講的敦煌學是兩回事，所以今天只說，常書鴻氏直至今天已有十六年以上的長久時間座鎮敦煌，繼續其有血有淚的努力，至於其他，擬一概從略。為了進行修理與模寫，其前提需先對千佛洞的現狀作綿密的調查。從這調查中，出現了千佛洞的各種研究。自然，敦煌學也獲得很大的進步。今天擬就此事再談一談。

最初進行的調查，據我所知是史岩教授以「敦煌石室畫象題識」為題的單行本。這是調查了號稱四八〇以上的千佛洞各室，將用漢字書寫的題識悉數輯錄者。總數有九四〇條，其中八七〇條僅有題名，其餘有題記者二三條，發願文十六條，功德記十條，功德銘一條，題梁四條、題額一條，榜記十四條，題字一條。其中含有敦煌研究所編號第一五六號窟前室壁上墨書的著名「莫高窟記」等。據聞，首將這墨書介紹給學界的，是一九四三年出版的「說文月刊」所載何世瑛氏的「敦煌莫高窟現存佛洞概況之調查」。史岩氏調查千佛洞，據其「敦煌石室畫象題識」自序，是在一九四三年春季至冬季，與何世瑛氏大約同一時間。總之，史岩氏這部書，在敦煌學上是很有益的。當然，這次調查是在一九四三年，該不是敦煌研究所工作而前往的。然而，史岩氏這部書卻是一九四七年二月，由敦煌研究所與華西大學博物館以及比較文化研究所聯合出版，似乎與敦煌研究所仍有深厚的關係。一冊一三五頁的石印本，全部都是以史岩氏親筆稿作版的。稍後，秉承常書鴻氏的指示而調查的，有閻文儒氏的「莫高窟的石窟構造及其塑像」。這不但是現狀的調查，而且是很精闢的研究。這位閻文儒氏在此之前也曾調查過榆林窟，並且提出精彩的報告。那份報告刊載於一九四六年十月瀋陽博物館發行的「歷史與考古」雜誌創刊號。關於敦煌石窟，在一九五一年閻氏之後，又有趙正之、莫宗江、宿白、余鳴謙等四人，受政府之命進行調查，並且由陳明達氏整編的「敦煌石窟勘察報告」、及敦煌研究所對此所作的「補充意見」，這也是極為貴重的調查報告，對於千佛洞的研究是不能忽略的文獻。閻氏的文章見於「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四期，陳氏的報告書見於一九五五年第二期「文物參考資料」。又載有閻氏之文的「文物參考資料」第二卷第四期及隨後的第五期，是從一九五一年四月至五月在北京的歷史博物館內，由中共文化部主辦的敦煌文物展覽會時，發行的紀念特刊。書中滿載了有關敦煌的論文，這與前述的「說文

月刊」特刊，都是必讀的重要文獻。「文物參考資料」一九五五年第二期雖非訂名敦煌特刊，但其內容卻已接近它的標準。只是今天在坊間已不易得到了。所幸，千佛洞的研究到此時為止，經由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長長廣敏雄教授以「最近的敦煌石窟研究」為題，很巧妙的加以整編，發表在「史林」雜誌第卅九卷第二號。教授是多年來從事這方面研究的專家。現在與其由我來介紹其論文，不如請各位自行閱讀，較為高明。但是教授發表它是在昭和卅一年，即一九五六年三月。當然，以後的研究並未寫上。而且後來敦煌學也實有日新月異之勢。在日本適值於那年春天，送來了張大千氏模寫的敦煌壁畫，舉行展覽會。繼之，一九五八年春常書鴻氏來日，始將其苦心之餘模寫成的千佛洞壁畫，以大量的資料在東京、京都展覽。因此，不再像以前那樣，僅憑文獻及照片，根據那些新資料，我們也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

在常書鴻氏來日的時候，除前述謝稚柳氏的「敦煌藝術叢錄」外，還有潘絮茲氏的「敦煌莫高窟藝術」與敦煌文物研究所編纂的「敦煌莫高窟」等，長廣教授所未及閱讀的新書出版。又由敦煌研究所出版了收錄千佛洞自北魏至宋代的壁畫模本六十九張的彩色版「敦煌壁畫集」，還有將壁畫模本作成木版的「敦煌壁畫選」共三輯。在日本，以常書鴻氏的來日為契機，由雜誌「佛教藝術」發行「敦煌佛教美術特集」。其中載有水野清一教授的「敦煌石窟札記」，乃是吸取了那些新資料的優異研究。在這本「佛教藝術」的特集號裏，還有藤枝晃、日比野丈夫、樋口隆康、岡崎敬等諸位教授也發表了各種重要的研究。這些都直接間接得力於敦煌研究所的調查，與中國方面實有彼此參照閱讀的必要。水野教授同時翻譯了常書鴻氏的「敦煌壁畫」，作為平凡社「中國名畫」叢書的一篇出版。在這叢書中，長廣教授也在水野教授先前，出版了一篇「敦煌」。以上兩者都是研究敦煌石窟不可或缺的入門書。又岡崎教授如前所述，曾經親自訪問過敦煌，根據其見聞，在龍谷大學西域文化研究會出版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發表了一篇以「大谷探險隊與敦煌千佛洞」為題的貴重論文。在如此流風下，敦煌學不但在中國，即在日本也一天天地進步。據去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卅日的「光明日報」報導，在中共政權的中央文化部以夏衍、翦伯贊、夏鼐、趙萬里等，聞名的學者及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常書鴻等為主要成員，設立了「敦煌」編集委員會。從當今一九六〇年起，將以七年計畫，由文物出版社出版龐大的「敦煌圖錄」十五冊及其解說。今後敦煌學將進步到什麼狀態，實難預料。

以上談了敦煌學的近況，尤其關於千佛洞的研究。現在各種學者在研究上所面臨的課題

，是現存的千佛洞有從北魏至元——即從四世紀至十四世紀這大約一千年的長時間內，開鑿了四八〇左右的石窟，究竟是怎樣被開鑿下來的？其中之一是考慮其前後關係，嘗試編年的研究。關於這一問題，東洋建築史專家福山敏男博士於昭和廿七年，在雜誌「建築史研究」第七號發表了題作「敦煌石窟編年試論」的論文。又將其加以訂正，於昭和廿八年十月，刊載於雜誌「佛教藝術」第十九號裏。這是對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作品。其後，依據新的資料又另行試論石窟編年的，就是剛才所說的水野清一教授的「敦煌石窟札記」。如能同時併讀兩位教授的論文，將有莫大益處。其次的課題是敦煌石窟的壁畫及塑像圖像學的分析。敦煌文物研究所似乎把它分爲(一)經變、(二)本生、(三)佛經故事、(四)尊像、(五)其他五大類，再細分爲各種類別。對於這一方面的研究，在我國早有小野玄妙博士及松本榮一博士發表過精闢的研究。但現在持有伯希和的圖錄及斯坦因帶回的壁畫圖錄與千佛消息(The Thousand Buddhas)的時代，情形已經完全不同了。尤其近年最被感興趣的是經變。這是與敦煌發見的一種俗文學變文有極深的關係。近來對其關連進行研究的學者很多。據我所知，例如美術史家梅津次郎、秋山光和，以及東洋史家藤枝晃等諸氏，發表了種種有益的論考。據聞，英國的偉利氏等，最近也特別對這方面寄與很深的關切。然而，進行這方面的研究，必需對佛教具有深厚的知識。無論如何，對這方面要當作我國學者的獨擅場，而進一步地去開拓才好。又對千佛洞的壁畫及塑像所表示的佛教史上的意義，我想對這些問題也可以提出同樣的呼籲。所幸，關於敦煌佛教，最近有塚本善隆博士的大作「敦煌佛教史概說」，發表於西域文化研究會的「西域文化研究」第一卷，這一點特別要請注意。其次的問題，是從中國藝術史上所觀察的研究。這似應細分爲繪畫史、雕刻史、建築史等，分別作專門的研究，此事含括很大的問題。不用說，近來認爲敦煌藝術是偉大的中國藝術遺產，而甚囂塵上。然而，事實上在悠久的年代裏，一直受了印度及中央亞細亞等強有力的影響，而形成了出奇的發達，很難說是基於純粹的中國藝術傳統上。考慮到敦煌藝術所具有的歷史意義，自然會發展到東西文化交涉史這個大問題，從這一意義上，敦煌千佛洞也正受到現在世界多數學者注視著。

含有以上諸多重大問題的千佛洞，究竟始於何時開鑿呢？普通的說法是在前秦建元二年（三六六）始由僧人樂尊開鑿的。但也發見了東晉永和九年（三五三）開鑿的紀錄。這些事情也成爲學者的研究問題之一。今後隨著各種學問的進步，學者對敦煌學的看法及問題的採取，諒必會漸漸改變。無論如何，對敦煌學具有輝煌歷史的日本，希望能夠再次更上一層樓，

更加發達，這是我最大的願望。

(二)

近年來敦煌學的內容漸漸有了改變。往年想要取作研究對象也難以如願的敦煌千佛洞本身，現在因種種事情的變化，已被大加利用了。對這一事實，我在前幾天曾經略為提過，今天擬就從前作為敦煌學中心的敦煌古書的研究，報告其近況的大概。因對這方面的研究，也與以前的情形有所不同。

談到敦煌古書，如所週知，其大部分都分藏於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巴黎的國民圖書館及北京的國立圖書館三個地方。其他也有若干散逸於中國及日本坊間者。但其數量，就全體來看是微不足道的。又傳聞，最近一九四五年在千佛洞的一角興建敦煌藝術研究所宿舍時，在那裏的清道光年間新塑造的佛像腹中得到了古書。據說是六朝寫經的殘卷。但只不過是六十八種，實不值得大驚小怪。所以談到敦煌古書，無論如何除往倫敦、巴黎、北京研究以外，是沒有辦法的。至於分藏於這三個地方的敦煌古書，只有北京圖書館部分早在一九三一年，由陳垣氏編纂的「敦煌劫餘錄」這份目錄，得以明瞭其全貌。而主要的倫敦、巴黎的部分，卻只知其一小部份而已。然而，大英博物館部分，在最近的一九五七年劉涅爾、翟理斯（Lionel Giles）博士將其多年調查的結果編纂成「大不列顛博物館藏敦煌漢文寫卷分類總目」（*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Manuscripts from Tunhuang in the British Museum*）出版。因此它的全貌也已明瞭。我們長時間所期待的書，終於出版了。這份目錄如果詳加檢討，難免也有種種瑕疵，但無論如何，將多達七千卷的大英博物館敦煌古書，一一加以綿密的調查編纂，而把它分為（一）佛教文獻、（二）道教文獻、（三）摩尼經文獻、（四）非宗教文獻、（五）印刷文書等五大類，再予細分著錄，加上簡單說明，可說是非常懇切的目錄。據載於目錄卷首的大英博物館東洋部部長巴西耳·葛蕾（Basil Gray）博士的序文，得知翟理斯博士為了完成這一目錄，自一九一九年以來繼續獨力編纂，其努力是非凡的。完成了這一工作之後，博士或許因鬆了一口氣，遂於一九五八年一月，以八十五歲遽爾謝世。我國石田幹之助博士於「東方學」第十七輯的「海外東方學界消息」中，寫了翟理斯博士的追悼文。希望各位都能一讀該文。無論如何，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古書，由於據翟理斯博士這份目錄，已能明瞭其全貌，對我們而言，該是何等的幸福。將大英博物館的敦煌古書全部拍成微卷，而這

膠卷被帶到日本，且公開於一般研究者——這是我們很早以來，爲了敦煌古書經過千辛萬苦的人，所夢想不到的事，然而此事恰好發生於翟理斯博士的目錄出版時間的前後。這是自一九五二年十月至一九五三年九月，擔任倫敦大學之一部的亞非研究學校（School of Oriental African Studies）的客座教授，逗留當地的東京大學榎一雄教授的無比努力，與始終支援他的東京大學山本達郎教授的盡力所賜，真不知如何感謝才好。那些微卷藏於東京東洋文庫，又東洋文庫與京都的人文科學研究所，分別由各方面的專家學者組織其調查研究委員會。據說，其目錄現已近乎完成。又這膠卷，如再詳細的說，它不只是大英博物館所藏的敦煌古書——這是漢文文書——還包含了舊印度省圖書館所藏的，以西藏語及其他中央亞細亞的各種語言文字所記載的敦煌古書。這一部份是山本教授所帶來的。對這件事，在去年五月由特殊文庫連合協議會出版的同會機關雜誌「文獻」第一號，有榎教授親筆記載的「敦煌文書攝影的回憶」，一讀便知其詳細。又同號「彙報」欄也載有東洋文庫提出的「斯坦因爵士帶回的敦煌文獻的寫真複製」的記事。無論如何，存在英國的敦煌文書，現在得以在日本自由地閱覽了。最近因由本部設在印度新德里的國際印度文化協會（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Indian Culture）接到了意外的喜訊。那是將該會會長拉古·維拉（Raghu Vira）博士近年在北京逗留中所拍攝的北京圖書館所藏全部達四千八百八十八卷的敦煌文書微卷，獲得中共政權的許可，加以複製，普遍頒布於研究者，近日即將開始作業。既然如此，數年後對於北京圖書館的敦煌古書，我們也不必再前往北京，而可以定居日本從事研究了。剩下的是巴黎國民圖書館的敦煌古書。對此，目前吉納爾（R. Guignard）夫人也在銳意調查中。不久的將來，可能出現完整的目錄。諒必也會出現全部的微卷。當然，目前尚未傳聞法國有此計畫，但就今日世界學界的趨勢而言，我確信早晚總會朝這一方向推動的。

如上所述，今天大量的敦煌古書在日本可以容易看到。所以最近這方面的研究非常發達。現在雖不能一一詳談。卻擬就多數學者特別感興趣者舉出若干。其一，仍然是有關社會經濟史與法制史文書的研究。對這方面早就表現了精采成績的東京大學仁井田陞博士，更加致力於此，其活躍的情形是很顯著的。他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裏，接二連三地發表了「唐律令格式的新資料」、「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唐代奴隸解放文書」、「斯坦因在敦煌發現的唐宋家族法關係文書」等諸篇。這與山本達郎博士在「東洋學報」發表的「敦煌發現計帳文書殘簡」及在「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發表的「敦煌發現戶制田制關係文書十五種」等，

都是非凡的大著作。些仁井田、山本兩博士的這些研究，都是以大英博物館所藏斯坦因帶去的敦煌文書為研究對象。對此，大阪市立大學內藤乾吉教授即採取存於法國的伯希和帶來的敦煌文書中的「唐律」，而將其精細周到地研究投寄到「石濱博士古稀紀念東洋史論叢」，應是這方面的精彩業績，我私下深深地佩服。對這方面的研究，一向堪稱是我們日本學者的專擅園地。但近年在西洋學者間，例如法國謝和耐（Gernet）氏在一九五七年「通報」第十六卷第五期（“Toung Pao” vol XLV 1957）登載了「由敦煌的契約看中國的販賣（第九～十世紀）」（La vente en Chine d'après les contrats de Touen-houang [IX^e-X^e Siècles]）這篇大作。由是觀之，實不能再以為日本學者的獨擅場而自我陶醉了。

與這些社會經濟史、法制史方面相對的，現在不特日本，在中國或者西洋引起莫大興趣的是敦煌發現的俗文學資料。所謂俗文學資料，也有很多繁雜的種類。其中最普遍引起興趣的是「變文」這一類。究竟「變文」是什麼？對其性質及語源嚴密地探究，還有很多問題。在今天學界尚無明確的定說。不過，可說是以一般大眾為對象，而以佛教故事為題材的一種說書。換言之，似可認為是一種「講唱文學」。最初是唐代寺院，為教化一般大眾的方便，盛行的一種「俗講」。據說，這是將難讀的經文意義很平易地解說，使任何人都能了解的。而用於這種「俗講」的底本，便是「變文」。然而，「俗講」本身就有很多種種問題。對此今天不擬深入的論列。數年前，梅津次郎氏在雜誌「國華」第六十四編第七冊發表了一篇「變與變文」的論文。將變文視作解圖文章。這是極富啓示性的研究。總之，從敦煌發見的「變文」，其形式是有揉合散文與韻文的特殊形態。其內容當然多數與佛教有關係。但也並不盡然。那種以有趣的說話為題材，在今天讀起來也覺得很有趣。何況它在中國白話文學史上也具有種種重要的意義，因此吸引了多數學者的注意。一九五四年出版了周紹良氏所編纂的「敦煌變文彙錄」，後來一九五七年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啓功、曾毅公等六氏編纂出版了「敦煌變文集」上下二冊，將到今天為止所發見的「變文」七十八篇予以集大成。在這部書的末尾，附有曾毅公氏輯錄的「敦煌變文論文目錄」，非常方便。由是得知，有很多學者對「變文」寄與無比的興趣。但是曾氏這份目錄，對於日本人的研究，除已漢譯者外，其餘都未被採錄，這是很遺憾的。我國敦煌學的長老那波利貞博士於一九五五年在「甲南大學論叢」裏發表了長篇論文，「關於中晚唐五代佛教寺院的俗講座變文的演出方法」，在筆端裏表示了他那旺盛的研究意願。近來金澤大學的川口久雄教授啦，「日本佛教文學研究

」的作者永井義憲氏啦，連這些專攻日本文學之士也對這方面表示關心，已有很多論文出現。在西洋，剛說的英國偉利氏對這方面也頗有興趣，最近為瑞典的支那學者高本漢(B. Karlgren)博士的古稀紀念而出版的「漢學研究」(“Studia Serica”)以「敦煌變文集札記」(“Notes on the Tung-Huang Pien-Wen chi”)為題，投寄了一篇論文。又法國的戴密微(P. Demieville)教授也似乎對變文頗具關心，在近刊的「亞洲彙刊」(“Asia Major”)「偉利博士古稀慶祝號」內投稿了「愛嘮叨的新婦小說」(“La Nouvelle Mariée Acariâtre”)一文，作為變文研究之一端。這是對經劉復氏「敦煌掇瑣」介紹以來出名的「齟齬新婦文」的研究。把充滿了俗字俗語及錯字、假借字的難解的文章，能正確的予以解讀，實在令人敬佩。我私下期待著教授將來能發表更精闢的研究。又在法國，梵迪爾、尼古拉(Vandier Nicolas)夫人於一九五四年，從國民圖書館的敦煌古書中找到了可供「變文」研究資料的一卷貴重畫卷。在其原色照片附加了詳細的解說後予以出版。這一畫卷原本雖無書名，卻是依據常見於各種佛典的舍利弗以神通力屈服了外道六師那有名的故事而作畫的，夫人給予「舍利弗與六師的錯誤」(“Sāriputra et les Six Maîtres d'Erreur”)的假題，在這繪卷裏記有說明此畫之意義的「變文」。這點是很珍貴的。但是一般所謂「變文」，其內容雖很有趣，卻因大量使用唐代流行的俗語，要澈底的解讀頗不容易。說實在的，周紹良氏的「敦煌變文彙錄」裏有相當嚴重的誤讀之處，王重民氏等的「敦煌變文集」也仍然有誤讀的地方。因此在去年——一九五九年出現了蔣禮鴻氏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這部書。雖是一本小冊子，對於讀「變文」成為很好的參考。此書一出，名古屋大學的入矢義高教授隨即在雜誌「中國文學報」第十一冊寫了詳細的批評。教授是這一方面的專家，以前對周紹良氏的「敦煌變文彙錄」也在「中國文學報」第五冊裏寫過極為詳細的批評。這兩者都不是單純的批評，無寧說是一篇精闢的研究論文。又最近側聞，有對「變文」中的押韻字，自音韻學上從事研究的青年學者。我雖未見過，相信今後應會從各方面對「變文」作更深入的研究。也必需如此做才對。

關於「變文」意外的說了很長。其次，敦煌的俗文學資料也被感興趣的是一種被稱為「曲詞」或「曲子詞」者。這是與音樂合唱的一種通俗歌曲。在部份學者之間，似乎認為這不單單是音樂，也伴有舞蹈。大體上是與普通說的「詞」屬於同一類的文學，不過，是更為大眾化的，從這意義上，也被稱為「俚曲」。這些東西都是從敦煌初發現的，所以也稱為「敦

煌曲」。近年蒐集「敦煌曲」的，一九五〇年有王重民氏出版的「敦煌曲子詞集」。其後一九五四年有任二北氏的「敦煌曲校錄」出版。任氏又出版了他對此項的研究「敦煌曲初探」。這些都是對這方面的貴重業績。不過，在我國不知何故，學者間對此並不像中國那樣感興趣。這是很遺憾的。看過這方面的敦煌古書每常以「雲謠集」舉為第一，而對其重要性開始注意的學者是我國的狩野君山先生。真佩服先生的慧眼。無論如何，盼望在日本能表現不辱先生的成果來。

其次對於敦煌俗文學資料，最近被感興趣的是王梵志的詩。它是與聞名的「寒山詩」有同一性質的一種口語詩。早經胡適博士喧嚷，在其「白話文學史」裏也被大大地提過。近年法國戴密微教授寄與深切的關心，在一九五七年度法蘭西學院的（Collège de France）講義中，對王梵志作了種種的考證。我承教授的厚愛，由其惠贈的「五七年度法蘭西學院年鑑」（L'Annuaire du Collège de France, 57^e année）的抽印本中，得窺其大要。期待著將來教授也能有精闢的研究發表。不料，我國入矢義高教授也與戴密微教授大約同一時間，在「中國文學報」第三、四兩冊裏對王梵志的詩發表了詳細的研究。又昭和三十三年我過還曆時，由諸友惠贈的「書誌學論集」中，也有教授惠投有關王梵志詩集的貴重論考。原以為目前對王梵志的詩特別寄與關心的是戴密微教授與入矢義高教授兩人，直至最近，拜讀了現在巴黎的中國吳其昱氏在一九五八年「通報」第十六卷第六期（"T'oung Pao" Vol XLVI, 1958）發表的「一個關於王梵志的敦煌寫卷」（Une manuscrit de Touen-houang Concernant Wang Fan-tche）這篇論文，始知仍有其同好者，而感到很安慰。吳氏注意到國民圖書館內伯希和帶回的敦煌文書第四九七八號中，有一篇題為「王道祭揚筠文」的文章。其中出現了王梵志的名字。這是從來沒有人注意到的珍貴史料，對考證王梵志年代很有參考價值。王梵志的詩與禪的思想也有深厚的關係。似乎值得進一步研究。王梵志的詩集，在我國平安朝時代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內也有著錄。據此可以確定也曾經流傳到日本來。因此今後也許會在我國某個地方被發見也不一定。我私下在夢想此事能夠成為事實。

以上談了敦煌的俗文學資料。但無論如何，在敦煌古書中，自昔以來還是對佛教有關者的研究最為盛行。近年也陸續有研究發表。例如：舉雜誌「印度學佛教學研究」一項便可以明瞭其事實。如檢查佛教各宗派大學所出版的眾多專門雜誌，其數量是不勝屈指的。其中擬特別提出來談一談的，是由龍谷大學的西域文化研究會於昭和三十三年以「西域文化研究」第

一卷出版的「敦煌佛教資料」。西域文化研究會是以調查研究西本願寺大谷光瑞上人的雄圖——大谷探險隊從西域帶回的大量西域文化史料爲目的而設立的。其最初出版的調查報告，便是「敦煌佛教資料」。它是一部堂堂巨冊，內容的充實不用說，堪稱是這方面近年來最高最大的著作。

又對佛教方面，在西洋也出現了種種的研究。前述的謝和耐氏於一九五六年出版「五到十世紀間中國社會下的佛教經濟外貌」(“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雖不能說是直接研究佛教，但是其中利用了很多的敦煌文書，是很有益的研究。在日本，曾致力於敦煌學的藤枝晃教授，去年在京都的「東方學報」第卅九冊裏發表了「敦煌的僧尼籍」論文，以敦煌文書證實了敦煌曾經是非常特殊的佛教都市。像這種兼具佛教史與社會經濟史的研究，可說是最近世界敦煌學的一個新趨向。另外，在西洋對佛教的研究當中，我最敬佩的是法國戴密微教授的「拉薩會議」(“Le Concile de Lhassa”)它是在巴黎大學的中國學研究所(Institut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叢書第七冊出版的。其內容是以巴黎國民圖書館中伯希和帶來的敦煌文書第四四六號題作「頓悟大乘政理決」這一卷子的翻譯及其註釋爲主。這個卷子在西藏佛教史上有重大的關係，而且是從來未被世人發現的。西藏的乞犁悉籠納贊王(Khri-sroñ Ide-btsan)、他是西藏最初的著名國王悉籠納贊贊普王(Sroñ-btsan Sgam-po)的四代孫，其治世大體上是在八世紀後半，被稱爲稀世的英主，在該王統治時，敦煌也歸於西藏的支配下。王從印度招聘了多種高僧碩德，大力振興佛教。當時在西藏也有很多來自唐朝的佛教僧侶。他們在八世紀末，大體上從七九二年至七九四年間，因與來自印度的僧人之間，就佛教教理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於是兩派終在國王面前互相爭鬥，印度僧代表蓮華戒(Kamalaśīla)大破唐僧代表中國大乘和尚，而取得勝利，爲西藏佛教史上的大事件。來自唐的佛教僧，由於當時在唐已盛行惠能南宗禪的思想，而主張斷絕一切分別頓悟的必要性。對此，印度僧這方面乃基於龍樹的中觀論思想，而主張應該注重教理，漸次修行。這一論爭歸於印度方面的勝利，成爲後來西藏佛教專向中觀佛教的原因。這是西藏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頓悟大乘政理決」是敘述唐僧主張的貴重文獻。戴密微教授很綿密周到地以一言一句都不苟且的態度完成翻譯。同時印度方面的主張，也詳細介紹宋朝施護所翻譯的蓮華戒「廣釋菩提心論」。教授在這「拉薩會議」裏(“Le Concile de Lhassa”)加了「八世紀時印度和中國佛教徒間

一個無爲主義的爭論」(“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etisme entre Bouddhistes de l’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ècle de l’Ère Chrétienne”)這一副題，即是基於剛才所說的理由。然而，教授這部書不僅僅止於佛教，其對翻譯所附的歷史上註解 (Commentaire historique) 且不用說，其序論 (Introduction) 中，對西藏古代史也有詳盡的研究，其中有很多新見解，對於西藏古代史上實有莫大的貢獻。教授這種不單單取敦煌文書之一加以解說或翻譯，而是長年累月從廣大的視野，傾其深遠的蘊蓄，去完成其厚重的研究態度，實堪作爲我們的模範。這位戴密微教授的研究出版後，引起了全世界學界的反響。尤其義大利的東洋學者戴瓦茲基 (Giuseppe Tucci) 教授，在西藏發現戴密微教授依據宋施護的漢譯本所介紹的「廣釋菩提心論」的梵語 (Sanskrit) 原本。將這梵本與西藏大藏經中的「丹珠爾」裏這本書的藏譯合併，予以重新出版，此事也曾引起了極大的注意。即羅馬的中亞及極東研究所 (Is. M. E. O.) 出版的「羅馬東洋叢書」(“Serie Orientale Roma”) 之一「佛教次要的教科書，第二部分」(“Minor Buddhist Texts” Part II) 就是。又關於印度僧與唐僧論爭的場所，戴密微教授認爲是西藏的首都拉薩。而戴瓦茲基教授卻主張不是刺薩，而是在拉薩東南叫薩姆耶 (Bsam-yas) 寺院。所謂薩姆耶寺院，是乞犁悉籠納贊王時代比蓮花戒更早受聘，從印度來到西藏的學僧爬德馬贊巴瓦 (Padmasambhava 蓮華生) 所建的大寺院。後來一直成爲西藏佛教的根本道場。戴瓦茲基教授因持此說，所以認爲戴密微教授所謂的「拉薩會議」(“Council of Lhasa”)，應該是「西藏的薩姆耶寺」(“Debate of Bsamyas”)，而加以反對。但是戴密微教授似乎沒有就此屈服，現在似乎成爲西藏學者間的問題。在日本，龍谷大學的芳村修基教授也插手這一問題，於前年出版了蓮華戒的另一著述的西藏文，作了重大的貢獻。現在不擬詳談，只是附帶地提一提。

關於敦煌古書研究的近況，其他還有種種想談的問題。例如：翻閱前年 (一九五四) 爲慶祝德國的東洋學者偉拉 (F. Weller) 教授年屆六十五歲而刊行的一大本紀念論文集「亞洲學」(“Asiatica”)，其中慕尼黑大學的富克斯 (W. Fuchs) 博士刊載了一篇以「西元六七三年的一個佛教敦煌卷子」(“Eine Buddhistische Tunhung-Rolle V. J. 673”) 爲題的論文。一如題名所示，這是唐咸亨四年所寫的「金剛般若經」的解說。有趣的是這部「般若金剛經」，並非斯坦因或伯希和帶去的東西，而是早在光緒廿五年 (一八九九) 從敦煌千佛洞發見的，不知何時被賣到慕尼黑去。這在種種意義上，引起了我的興趣。又同樣讀得很有趣

味的是現在居於巴黎的中國人王聯曾氏，利用伯希和帶去的敦煌文書中眾多的「切韻」所寫的「一本唐韻字典」(“Un dictionnaire Phonologique des T'ang”)以及同樣居於巴黎的中國人陳祚龍氏，對著名的唐太宗「溫泉銘」唐拓本加以研究的「溫湯銘」(“On the Hot-spring inscription”)等，都是最近出現在「通報」雜誌上的貴重業績。在日本也有大正大學的吉岡義豐教授及岡山大學的大淵忍爾教授相繼發表的敦煌文書中有關道教經典的研究，以及大阪市立大學的西野貞治講師在各種雜誌所發表的敦煌文書中有關說話文學的一連串研究。這些都是我特別感到興趣而讀過的精彩研究。因今天時間已經很久了，擬改天再予介紹。談到敦煌古書的研究，不但範圍遍及多方面，而且近來由多數學者陸續表現了精彩的成績，實非淺學寡聞如我者所能追索的。何況，對於用漢字以外的文字所記載的文書研究，是我所全然不知道的。所以以上所談，不過是我見聞所及的極狹窄範圍。就此結束今天的報告。

敦煌學第六期郭自得、王三慶先生合譯「敦煌學五十年」勘誤表

頁	行	誤	正
5	16	士大天	士大夫
13	10	未被携往西洋	已被携往西洋
13	17	敦煌古書照片目錄。 另一樁……	敦煌古書照片目錄。「又其中關於初唐寫本『周易』羅振玉先生早已寫了校勘記，也刊載在裏面。」 另一樁……
14	8	並附有羽田先生簡單的解題	都附有羽田先生簡單的解題

敦煌學 第七輯

編輯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出版者：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學研究所 敦煌學會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一月出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